

日本往事系列

军国

见证从愤青到全民颠狂的**幕僚**历史进程

[日] 俞天任 著

一群号称“爱国青年”的军国幕僚们
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的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书原名《有一种战犯叫参谋》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新诠释引发多方争议

幕僚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本往事系列

军国

见证从愤青到全民颠狂的()历史进程

[日] 俞天任 著

幕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国幕僚/俞天任编.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12

ISBN 7-5057-2284-0

I. 军… II. 俞… III. 军队体制—研究—日本 IV.
E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5196 号

书名	军国幕僚
作者	俞天任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960×64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000 字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284-0
定价	25.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甲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序：是什么妨碍我们认识日本

1989年，当中国人还在热情地学习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一位名叫比尔·艾默特的英国驻日记者写了本《太阳会沉下山》的书，预言日本经济将会走向崩溃；2003年，中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奇迹欣喜不已并认为日本早已过气时，又是这位艾默特预言日本经济将东山再起，他写了篇《at Last, Japan is Flying Again》的文章，接下来又写了本《the Sun Also Rises》（《太阳还会升起》），艾默特再次准确预言了日本经济将重振的走势。不过，此时的艾默特早已由《经济学家》的记者变成总编了。

艾默特之不为中国人熟悉并不奇怪，因为，日本经济在小泉时代已走出困境亦少为人知。中国人通过媒体所知的，往往仅是小泉上台以来的对外强硬态度。——如果对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国内的巨大变化所知无多，则对小泉获得极高支持率亦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如果想了解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如何进行的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一书，是这方面最权威的



实证作品。

作为一个较长时期关注日本的新闻人，我很在意中国同行对日本的报道和介绍，而且经常对比中国新闻界与其他国家对日本报道介绍的差距——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新闻人对日本的报道介绍，不但肤浅而且非常片面。以今天中国新闻界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中国记者中永远诞生不了艾默特和吉莲·泰特这样的人。——日本经济衰退已过去十多年，但今天，中国对日本经济衰退的总结，几乎还一边倒地认为，是日本当年接受了“广场协议”上了美国人的当，但笔者接触到的日本记者或官员却无一认同这种阴谋论。比这种肤浅认识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欣欣向荣的经济奇迹下隐藏着的经济体制问题不但与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

新闻如此，有关日本的学术与通俗书籍也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中国认识了解日本，最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恐怕仍当首推戴季陶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可惜的是，就是这两部作品，不但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世易时移，它们对认识了解今天的日本，作用恐怕非常之有限。——尽管近年中日关系渐趋微妙，有关日本题材，不但总是媒体热点，而且相关的书不断出版，但中国人了解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其间的距离不但没有被缩小，事实上反而在扩大，很多时候，阅读日本只是在强化固有的想象。

而在日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题材之广泛远远超过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举凡今天中国热点的三农问题，

贫富分化问题、贫困生失学、房地产泡沫乃至环境污染问题，统统可在日本书店找得到相关书籍。更不要说多如牛毛的中国历史类书籍，光《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就差不多和日本战国群雄打了个平手，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更是应有尽有。应该说来，这类书只证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及日本对邻居当下发展的关心。当然，日本书店永远少不了为侵略辩护的声音，同样，与“警惕日本”相对的是，各种名目警惕中国的书也林林总总。但最恶毒诅咒的，往往作者却是旅居日本的中国台湾人，不过，国内媒体在介绍这些恶毒的作品时，经常会忘记顺带介绍作者的身份。

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国民上下都在丧心病狂地打中国的主意，虽然我们经常会被人告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愚昧和蛮横逻辑。因为它反过来还可以说，因为日本人对中国暗怀非分之想，所以要研究中国。但事实上，就我所知，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这样喜好关心浩大政治，更无中国这种人人皆能成为国际战略家的热情和天赋。

不错，中国是距日本最近的国家之一，作为落后国家，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更多的留学人员，投入了最大的研究力量，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介绍水平，离那些对日本并不太关心的发达国家还有着天壤之别。最近，一位著名学者为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日本的通俗作品作序，序言中写道：“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那么肤浅，充满了误区和盲点？”但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序言中多少就充斥着肤浅的认识和误区，甚至不妨说，那本书本身就



无意中强化了对日的肤浅认识，算是对序言中问题的最好注解。

我们这么关心日本，但为什么对日本的了解却始终流于肤浅并充满误区？一方面，这是国家整体研究教育水平的体现。中国学界和大众传媒在方法论和研究工具的落后，不但体现在对日本的研究了解水平上，同样体现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另一方面，不能不说的就是，中国对日本缺少一种平常之心。无论日本之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上有怎样的特殊性地位，但我们不可以把特殊的情感带到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中去。否则，我们认识和了解的日本，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而日本国民，仅仅是一个仇恨想象中的特殊族群。

不能不说的是，尽管中国书店里有关日本的书总是长盛不衰的热门，但与日本相关的书很大部分题材都集中于60年前的战争上，即使谈到今天日本，也多半是一种对前者的延伸阅读，纯粹研究介绍今日日本的书，不能说没有，但大都躺在冷僻的角落，在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永远热闹的是60年前的历史和今天日本的威胁。这种独特的景观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你很难看到关于古代日本的中文书籍。如果书店的书是面镜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日本几乎还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那个日本，至于当下的日本如何，若不能理解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今天的日本，只能说明，多数人认为今天的日本就是昨天的日本。

不过，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日渐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由于两国民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和认识，除了新闻媒体和学界外，民间个体的观察和认识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和途径，而且，对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关心者能超越不是为仇恨的动机，不是因为“日本威胁”的紧迫，只是出于朴素的对知识的探求和对世界认识了解的好奇。不能不认为，也许这才是中国人能平和真实地了解日本的开始。从《幕府大将军》、《最后的武士》、《军国幕僚》这套书中，也不难看出，中国民间历史爱好者对日本的研究了解已达到了相当水准。这三本书的作者无一专门研究日本的学者，而是业余历史爱好者或旅居日本的华人。

如果说，武士精神是一把解读日本近代历史走向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三本书恰好讲述的是武士精神在日本不同时期的折射。《幕府大将军》介绍的是一代枭雄德川家康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历程。如果我们要从这位塑造日本历史的巨人身上找到近代日本历史轨迹的隐喻的话，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位才智在当时并不出众者的身上的隐忍和忠诚，并且靠着长寿，终于熬到了群雄俱灭，一统日本。德川氏的隐忍精神是日本武士刚健倔强的另外一面，在美国佩里“黑船”打破日本锁国政策时，日本人由激烈的“攘夷”转为“开国”，在1945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发出“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后，准备“一亿总玉碎”的日本军民立即放弃抵抗，都是典型表现。

而《最后的武士》虽与好莱坞著名大片重名，但却远非那部浅薄猎奇作品可比，其对日本幕末维新志士当年活动的翔实介绍，也许在大陆中文世界是仅有的，除



确其知识性和趣味性外，如果有心对比中日两国先后与西方世界接触并开始“师夷”为何结果却迥然不同，也许这是个非常不错的窗口。除了当年的日本是封建制改变起来较容易而中国高度的集权专制体制难于变革外，日本当年的变革推动者是“草莽崛起”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而中国变革的推动者早已人过中年，功成业就需要面对清廷统治者猜忌，这种巨大差别亦是重要原因。——想当年清廷中兴名臣的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资质气度当远胜崛起于草莽的伊藤博文等人，但，老树新枝无非枯木逢春的回光返照，何得日本新树初立的无限生机！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是，当初的日本维新志士，其实不乏义和团式的色彩，譬如高杉晋作，在1862年到上海见过世面后，一方面对西方世界的技术极端震惊，但另一方面深恨西方人在中国的作威作福，回国第二年就把英国公使馆烧了，还拉上小兄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组建了一支“奇兵队”，抗击英、美、法、荷四国入侵军队。但是，唯其年轻，故能义无反顾牺牲一切地全身投入到日本的变革之中。读到这本书，难免要人感慨：先有发奋的青年，后有发奋的国家。

至于《军国幕僚》更是本奇书。今天，我们探讨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多少已习惯性简单地将其总结为日本的国民性或日本狭小的天然禀赋，而忽略总结其制度原因，尤其是当年国家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巨大缺陷。《军国幕僚》也许是国内第一本详细介绍这方面的著作。该书作者是长期旅居日本对日本近代历史研究颇有积累的华人。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军事体制从维新时代开始的

形成过程，以参谋本部和参谋为观察重心，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到最后使日本灭亡的二战的不同作用进行逐一分析，详细分析介绍了日本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军事管理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把日本武士的“下克上”极端放大，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导致全民疯狂投入必然失败的战争中去。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会使不少读者获得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解读视角。它不仅使我们对了解当年日本为何发动一场战略上极端失败的战争有所帮助，亦可对今天日本的再认识有所帮助。这三本书连到一起读，也许更易于令我们了解认识武士“下克上”传统是日本迅速出演了一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命运。

这三本书出现在中国书店的书架上时，也许可以说，中国社会已在开始真正尝试了解日本。当然，民间人士出于兴趣的观察和认识，对日本的认识和介绍很难有深厚的学理背景，不可能达到像艾默特那些人的水平。不过，别忘了，当年的戴季陶、王芸生都不是真正的学者，同样缺乏深刻的学术背景，但不妨碍他们对日本有较深刻的洞见。而且，在趣味性和知识性上，这三本书都迥异于今天任何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籍，仅此而言，这三本书也值得闲暇之时展读一番。

黄章晋

2006年6月4日于北京



序言：大国的失败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成为今天影响中日关系的直接症结，而其之所以成为触发中国人情感和神经的最重要原因，恰如中国官方所说，那里供奉着日本甲级战犯的灵位。然而，国内很少有人细究，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决的甲级战犯有几位是侵华战争中的真正元凶，或者反过来问，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有几个人是被送上了东京法庭真正得到了严惩。

某种程度上，二〇〇六年影响最大并获得相当好评的主旋律影片《东京审判》，就是一个对该问题并未认真思考的个案，而且在史实的追究上存在相当多的遗憾。譬如，电影中的旁白称，梅汝璈想把昭和天皇作为战犯送上法庭，但却未能实现。实际上，主张审判日本天皇最积极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譬如，电影里（前）苏联派出的格隆斯基检察官始终一言不发。但实际上，麦克阿瑟最初打算在东京审判时仅仅审理日本军阀“偷袭”美国问题。到了最后，中国问题变得如此突出，（前）苏联人功不可没。甚至，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没有（前）苏联人的坚持根本就不会被逮捕起诉。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谈起东京审判，很容易把它当作为中国人清算日本战犯的象征，事实上，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主要是在中国受审而非在东京，且主要是乙、丙级的战犯。东京审判，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美国人或者干脆说是麦克阿瑟的审判。因为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的第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以东条英机划线，这就使那些与东条关系不好的战犯逃了一劫。看看甲级战犯的名单就不难发现这里的问题。

被正式起诉的甲级共 28 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武藤章。

28 人中，几乎都是按照美国人基于本国制度下责权对应理解来圈定的，且主要是对盟国的侵略罪行而非挑起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一开始检控方却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在太平洋战事后期曾先后在东南亚地区任指挥官，犯有残害当地军民的严重罪行。

被处决的 7 名甲级战犯中，唯一因在中国犯罪而被处决的是松井石根，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时日军最高指挥官。如果必须为部下罪行负全责，那么松井总死得不算冤。但是，暗中直接鼓励日军有计划屠杀战俘的元凶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鸠彦亲王，而松井在日军进南京城前曾下令日军严守军纪、大屠杀刚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相比朝香鸠彦亲王的无人追究，松井就死得有点冤了。

要仔细追究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弄清楚的是，当年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再到“七七”事变，侵华战争是怎样发动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力量一步步推动的。

对比二战时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前）苏联，均是集中全力按精心设计的方案以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而日本，则是不断分兵，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且战争能力是逐渐被动员起来的。

如果我们认可日本在“七七”事变时有预谋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吞并中国的说法，那么也必须承认，“七七”事变前，日本未做任何全面战争的动员准备；全面战争爆发后，随着战线的延长才开始逐次添兵，明显缺少一举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兵家大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认为，日军如有正确的战略规划，不难在很短时间内彻底使中国丧失继续抵抗能力。但为什么战争打到第五个年头，中日两国才正式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中国大陆的进攻势头停下来，陷入战争僵局后，突然又要腾出手来集中陆海精锐主动与美国大打出手？其实这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会失败？仅仅是实力对比还是另有必然失败的制度因素？

我们在回顾和描述六十多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时，往往习惯于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义角度去总结论述，或者仅仅从最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实力对比来做技术上的总结。长期以来，对日本形成产生军国主义制

度土壤的历史过程，对日本逐渐走向侵华战争背后的决策过程和推动力量，国内客观、认真、透彻分析论述的著述甚少。如果缺少对上述问题的制度性追究，我们不但无法弄清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具体制度和体制的产物，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事实上，正是因为上述状况和其他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许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战犯，最终逃过了历史的审判。譬如，东京审判时，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元凶河本大作正在山西当阎锡山的坐上宾；“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被法庭传唤，但他只作为证人出庭（石原曾自请审判，被拒绝）；参与制造“上海事变”的辻政信在悄悄为蒋介石绘制东北地图，虽然他因在东南亚的累累恶行正被美英通缉……

诚实地回顾历史，如果日本当时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前）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也许我们今天真的很难说，最后的历史会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弱国被牺牲给大国是当时正常的国际生态——美国就曾准备向日本出卖中国利益；而侵略者并不总是要受惩罚的——（前）苏联曾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入侵了芬兰、与德国瓜分了波兰，在德国取得**西线战场的辉煌胜利**时热烈祝贺了希特勒“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那么，日本对外战争冒险的不断**冲动和**导致其走向灭亡的制度性原因究竟是什么？

您手中现在正翻开的书，就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军国幕僚

日本往事系列

12

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那段历史的高度关注和长期在日本生活的经历，使他有可能通过对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一般性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是国内唯一一本专著，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帝国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完全混乱的。

书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蒋介石在无法忍受重庆大轰炸时对身边人说：“娘希匹的，我也给他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

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哪三个人？”“少佐，中佐和大佐。”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当时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日本民族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而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唯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也许我们很难全面掌握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六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今天，CCTV的专题系列片《大国崛起》又使大国崛起的话题热遍中国，因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将在未来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几乎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一个后发的大国来说，除了有几百年来崛起大国的成功经验总结外，还应当有对那些在历史上遭遇过巨大失败和挫折国家的教训总结。因为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其成功崛起的经验中，往往就蕴涵着日后遭遇重大失败的因素。而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某种程度上，厘清旧日本迅速冒险、崛起与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其内生性的制度成因，是我们吸取日本崛起经验时更重要的一部分。

在《大国崛起》一片中，其实日本、德国等国家都可作为反面教材来总结，而非纯粹的成功者。如果以富国强兵作为大国崛起的指标，这几个后发崛起的大国，都在达到顶点时，遭遇到重大失败：首脑遭审判、政府被重组、领土被重新划分。从外在因素上说，都可以总结为遭遇既有国际秩序主导者的集体阻击，但从内在因素来说，都不难发现，外在环境不过只是其内在的制度性必然引发的结果。